

鄞州文史



第六辑 (2008年)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主办

鄞州文史

YIN ZHOU WEN SHI

第六辑（2008年）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主 任 唐 军
副 主 任 王飞龙 朱国富
委 员 姜芬琴 朱富国 宁鲁鸣 鲁宝明
邵永国 曹怀玉 戴松岳

《鄞州文史》编委会

主 任 朱国富
副 主 任 姜芬琴 邵永国 戴松岳
委 员 谢富国 施国裕 张善庆 张忠良
徐 敏 许静杰 陈 勇 史晓卿
主 编 戴松岳
副 主 编 史晓卿

主 办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编 辑 《鄞州文史》编辑部
地 址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邮 编 315100
电 话 0574-87523806
传 真 0574-87523832
E-mail daisy@nbyz.gov.cn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陈 勇
刊名篆刻 史晓卿
印 刷 宁波精英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年8月

目 录

鄞州人物

甬上耆硕之楷模——张申之	袁元龙 (001)
功业长留人间——纪念史学名家童书业诞辰百年	乐承耀 (006)
廉洁丞相魏杞	郑传杰 (018)
知稼穡之艰难 念民生之不易 ——耕织图诗作者楼铸考略	俞信芳 (038)
民族英雄张苍水	戴松岳 (061)
两朝帝师张家骥	章国荣 (080)
从报业巨子到政界高参——董显光	严伟祥 (087)

专题研究

文献传播视野下的《三字经》作者问题	钱茂伟 (092)
古本《三字经》今朝回故乡	王重光 (111)

望族研究

鄞槎湖张氏渊源沿革及谱系考述	袁 慧 (116)
----------------------	-----------

文史论坛

鄞州与慈溪：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文化发展态势	周乃复 (134)
鄞州水利史泛谈	缪复元 (147)

中外交流

清末民初的宁波留学生	谢振声 (154)
鄞县《牡丹灯记》与日本《牡丹灯笼》	杨古城 (168)
华花圣经书房与宁波方言著作	龚缨晏 (174)

佛教文化

从明觉寺遗址的发现看鄞州的佛教文化 冯炜达 (180)

宁波帮研究

海外宁波人社团研究 孙善根 (185)

雏议《上海工商人物志》中的鄞州籍商帮 陈万丰 (195)

正本清源

两位大儒与文种原籍 周冠明 (209)

鄞令风采

王章与鄞俗“太阳生日” 徐建成 (211)

医林大观

中医怪杰范文甫 吴言铭 (217)

文化学术

明代鄞县“高年诗会”综论 张如安 (229)

戈鲲化与他的《甬上竹枝词》 周时奋 (250)

吴经熊笔下的宁波人 黄百竹 (260)

近二十年张其昀研究综述 王 瑞 (263)

书画艺术

翰林书家高振霄 史 波 (275)

元代摹本《宸奎阁碑铭》残碑考证 李本伉 (285)

民国春秋

民国时期的韩岭民众教育馆 金圭章 (288)

甬上风情

宁波的喜俗·生俗 周时奋 (293)

鄞州农村电影放映回顾 陈济开 (299)

尘世旧影

长行.....翁绍初 (307)

鄞山鄞水

横泾：千年古村展新颜.....史芸飞 (309)

福泉山：茶香满山观湖海.....俞珠飞 (316)

山川风物

宁波三江口城池考释.....林士民 (322)

鄞州古桥综观.....张德华 (332)

鄞城往事

朱纨与宁波.....白冰 王慕民 (351)

抗英夷鼓角相闻.....胡纪祥 (362)

清民时期鄞县的救济事业.....鲁 刚 (368)

掌故轶闻

沙孟海先生关于天一阁藏明史稿的信件.....方祖猷 (376)

罗隐与鄞州.....郑 超 (385)

宋诏桥畔救康王.....张志原 鲍贤昌 (391)

旧文新读

万金湖铭解读.....李燕津 (394)

甬上耆硕之楷模——张申之

袁元龙

我认识申之先生是60多年前的事了，他是我的父执辈，又是我姐夫（姚杏棠）的姑父，沾上点亲戚关系。

他学识渊博，德行高洁，阅历丰富，贡献卓越，爱国爱乡，急公好义，恂恂儒雅，和蔼可亲，是宁波人民素所敬爱的“乡邦耆硕之楷模”。

我与他年龄相距较大，他长期在政府和群众团体任要职，我则是在甬、沪两地读书求学，平时极少有见面的机会。到了1945年我们订婚，以及1947年春季假甬江女子中学礼堂举行婚礼，他都亲临致贺，并为我们证婚。那天参加婚礼的还有李庆坤先生（效实中学读书时老师，又是我的结婚介绍人）和沈貽芴先生（甬江女中校长）等。庆坤老师今年高寿99岁，对此记忆尚清晰。61年前那份绢本彩色精印的龙凤结婚证书，我至今仍珍藏着，上面有申之先生的签名与钤印，对我本人来说，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纪念品。

我所知道他老人家的的一些情况，除史志及政协文史资料等记载外，其余是听我姐夫生前口述的，亦有解放初期（1950—1951）我在工商界时亲见亲闻的。因为申之先生兼任通运汽车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经营鄞慈镇公路及鄞奉公路的客货运业务）。

申之先生——我们都习惯于这样尊称他，正式名字张传保（1877—1952），字申之，号继望，以字行。鄞栎社乡里仁堂村人。

然而寻根追源，他是属于甬上望族槎湖张氏的一支。他的祖上在明代显赫得很，出过两位兵部尚书：张邦奇和张时彻，还有一位光禄寺少卿张子韬，三个人的官声都不错，全祖望先生在他所著《甬上族望表》中列为“槎湖张氏三望。”

不久前，袁慧(天一阁副研究员)写过《鄞槎湖张氏谱系考证》一文，提到“张申之先生虽是栎社乡里仁堂村人，有人称是从鄞西张家潭迁来，而且传字辈份恰好是槎湖张氏的第十九代。……但不知何故，槎湖张氏族谱的《世传》中竟未收这样一位重要人望。”我现在可以进一步提供补充佐证：张传保之父名守澜，业商并重儒，这可能是浙东人文的一个传统吧。《鄞县志·人物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称他“为人豪爽好义，乐为乡里公益，影响所嗣，遂开三代善举家风。”《族谱》又称，自第十二世起，亦即自明嘉靖年代起，槎湖张氏辈份排行为：“子应尚孝德 永守传其则 高厚必滋培 远大嗣荣锡”。先生之父守澜，在族中是第十八代“守”字辈；本人传保，恰好是第十九代“传”字辈；其侄其昀为“其”字辈。这完全符合《族谱》排行的顺序，说明他确是槎湖张氏的一支。

申之先生自幼聪颖勤学，课余之暇，参加农田力所能及的劳动，养成刻苦务实的作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第三十九名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省城考中举人，其同科举人还有范贤方(辛亥革命宁波光复主要领导人之一)、忻江明(董沛之婿，《续甬上清诗略》作者)等。而《宁波市志》与《鄞县志》均作二十七年中举，今以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选举》的记载为准(详见《鄞县通志·文献志》第1077页)。其所选策论为《大学》第二十四节“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先生因心仪新学，文中多处论及欧美政体，其识见为应试诸生中之少见者，遂中式。

光绪三十二年(1905)，应当时宁波知府之邀，先后创建宁波师范学堂、宁波中学堂，成立教育会。宣统元年(1907)，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又继任省预算审查委员会委员长。次年，在甬创办《四明日报》，自任经理。辛亥革命宁波光复后，任宁波军政分府财政部长，复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国会众议院议员。

1923年，因曹锟贿选总统(投他一票，即送银元5000元巨额贿款)，张传保坚决抵制，毅然辞去议员之职，赴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任广东政府国会议员。

据我所知，他与另外两位浙江嘉兴籍国会议员——褚辅成先生(慧僧)和沈钧儒先生(衡山)，志趣相投，心意相合，共同抵制曹锟贿选，又同赴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遂义结金兰，成为异姓兄弟。三人中慧僧先生最长，衡山先生次之，申之先生年龄最小，每人相差二岁。解放前，我就读于上海法学院，褚辅成先生是我们的校长，沈钧儒先生是教务

长；后又向我姐夫询问，证实确有此事。

申之先生一生的主要业绩，除早期对教育工作作出过贡献外，可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表述：

一是长期坚持不懈，为民主革命作出尽己之力的贡献。1911年11月5日，宁波民间的革命武装——民团、商团和尚武会会员千余人，为响应武昌辛亥革命首义，在同盟会骨干范贤方(仰乔)、魏炯(伯桢)等率领下，占领了宁绍台道道署，道台文溥闻风先行逃逸，当晚就成立宁波军政分府。其时陈训正(杞怀)被推举为军政分府财政部长。杞怀先生“自以不娴计政，辞不受。”于是众推申之先生继之。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个任务非常艰巨、工作非常棘手的角色，如何解决军政分府急需的日常开支问题，谁都没有现成的答案。申之先生建议，为济燃眉之急，军政分府暂时自行发行纸币。但当地商民，对这种纸币将信将疑，心存观望。申之先生就会同赵家荪先生(同盟会会员，宁波光复领导成员之一)共赴浙海关协商，请求海关在收取关税时，让军政分府的纸币顶用，10天之后，军政府负责将海关所收的纸币赎回，折兑银元。凭着申之先生的信誉和威望，海关答允了。市民们见海关已经通用，遂对临时纸币深信不疑，终于上市流通，缓和了暂时的财政困难。那时，浙江军政府宣布全省豁免田赋一年，并撤除原有厘卡税局。宁波为浙东重镇，旧军陆军协统、防军统领均率部驻扎于此，协统刘洵、防军统领常荣清均表态拥护光复，分任军政分府正、副都督，军饷所需浩繁，还有军政府职员的工薪支出……等等，这些都是难解问题，需要一一去认真解决。军政分府开会商议，决定从三个方面寻求对策：一是向巨商富户募捐。但当时富商大户多已迁往上海，在宁波仅募得捐款118000多元(银元)。第二个办法是变卖官营产业和公有土地，这方面倒筹措了不少费用。三是接收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华银行，由赵家荪出任行长。稍后全省光复，政令统一，各地军政分府先后完成历史使命。

1927年3月，北伐军已驱逐军阀孙传芳盘踞在浙江的残余势力，因原知县逃离，曾一度代理县知事，后又被公推为宁波市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主席。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又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共产党人的活动。

其间，曾一度出任浙海关监督(当时的浙海关设在宁波)。当时的海关，积弊甚深，先生深入调查，剔除陋规，堵塞漏洞。他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深得商民与劳工赞扬，称其为“处脂不润，家无余财，而岁增国税十余万金。”直至1936年先生60华诞时，宁波工会、八闽渔商还分

别送了“硕德耆年”、“万家生佛”两方金字匾额，以颂扬他从政时为民办了好事(请参见宁波市政协编纂的《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第121页)。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宁波，首先是庄禹梅先生遭到逮捕；他与革命志士王鲲、杨眉山以及工商界知名人士俞佐庭，甘冒风险，前去宁波警备司令部向司令王俊提出严正交涉。稍后，王鲲、杨眉山两同志亦遭逮捕，他又去打听消息并商讨营救之策。不久，蒋介石之兄蒋介石挤入政界，继任浙海关监督，调先生为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未就，遂辞政回里。

又据其堂侄女张萍女士回忆，解放前夕，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党员叶曙声、贺思真(以上两位均为女性)、忻伟镠等五人被捕，受严刑拷打，但他们坚贞不屈。叶曙声是张萍的挚友，故请求伯父转托鄞县县党部书记长汪焕章、《宁波日报》社长沈友梅(国民党鄞县党部内亦居要职，后继任书记长)设法保释，这五位同志终于先后获释(详见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辑《风雨见真情》一书)。

二是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服务。1924年，先生辞政回里后，即投入鄞西七乡浚河事宜，被推为总持。鉴于鄞西水利百年失修，淤塞严重，不少桥梁倾圮，先生乃亲率修河群众，浚南塘河60余里，修桥梁、路亭数十座；后又主持全鄞县水利，为鄞县的农业灌溉及河网交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赴沪，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办事处主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享有很高知名度，它团结着许多热爱祖国、热爱桑梓的各界人士，为家乡公益捐资出力，多有贡献。1931年，申之先生与乡贤乐振葆等共同发起建造灵桥，至1936年落成。这座建筑质量上乘、饱经沧桑、傲然屹立的灵桥，经人民政府出资整修后，至今仍英姿焕发，雄立在奉化江上，继续在为人民服务。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发起“一·二八”淞沪侵略战争，大批甬籍同乡亟待返乡避难，先生千方百计调度轮船，多次遣送同乡回鄞。种种爱国爱乡善举，为鄞人赞扬乐道。

另一件在文化建设上的公益善举是重修《鄞县通志》。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起，在他的倡议下，组织力量，筹措经费，建立鄞县通志馆，新修《鄞县通志》。他亲任馆长，聘陈训正为总纂，方志专家马涯民为主编，历时十八载(其间因抗日战争爆发延缓较长时间)，几经周折，终于编修完成一部材料丰富详实、分类细致、卷帙浩繁、校勘精良的民国《鄞县通志》，计36册，并另附巨幅地图26幅，为市县地方志中佼佼者，被誉为“古今方志第一”。

此外，诸如抗日战争中的难民救济，赞助圆瑛法师兴办四明佛教孤儿院等慈善事业，先生总是率先捐资，带头号召，并兼名誉职务，对甬上公益事业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三是积极投入宁波交通运输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他鉴于宁波的公路的交通运输与港口商埠很不适应，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无力投资，乃筹组民营通用汽车运输公司，出资修建并经营鄞慈镇与鄞奉公路的客货运业务，成为解放前直至解放初期宁波公路营运的主力军。

附带叙述一下其哲嗣伯觐先生的情况。张伯觐(1902—1973)，乳名七三，因出生时，适逢祖父守澜公七十三岁，故取此名。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后入上海大同学院肄业，1921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山口高等商业学校，1923年回国，转入日人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1931年毕业后，短期留校任讲师，后即经营纺织企业与纺织交易所。不久回甬，协助父亲创办通运长途汽车公司，任副经理、经理等职；其间，还尽力协助父亲兴修家乡水利事业。解放后，先后任鄞县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县农林局、水利局副局长，鄞县副县长。1959年，任宁波市水利局副局长；1962年，当选为宁波市政协副主席。他长期与党同心同德，亲密合作，工作任劳任怨，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水利工程及技术、经费等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是一位爱国敬业的民主人士。

申之先生在解放初期，历任浙江省和宁波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2年去世，享年七十有六。

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展是非常必要的，对防止和惩治贪污腐化，抵制资产阶级的进攻与侵蚀，都有重要意义。在具体贯彻执行中，有一些过头的地方亦是在所难免。但社会上流言较多，工商界中亦有极个别意外事情发生，这些对申之先生在心理上形成了一定的刺激与压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士不可辱”的传统观念，先生一时想不开，周围的人又没有深入细致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因此以不正常的方法终结了自己的一生，实在令人悲痛和遗憾。据闻，市领导得知此噩耗后，亦深感意外，惋惜悲悼不已。关于此事，本人惟恐年深日久，衰朽之人记忆或有出入，最近特询问一位张氏族人，其记忆与我一致，故记上一笔。

缅怀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硕学盛德，爱国爱乡，身体力行，严以律己，乐于助人，公益为先，桑梓是重。为政不图名，处肥不谋私，称之为“甬上耆硕之楷模”，是名副其实的。

功业长留人间

——纪念史学名家童书业诞辰百年

乐承耀

一、前论

童书业，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友梅、章卷益、卷益、童疑。原籍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清末，其祖任安徽道员，举家迁居安徽。1908年5月26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生于安徽芜湖。出身仕宦世家，自幼体弱多病，为此延师在家受旧式传统教育。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能将经典古籍熟记在胸，背诵如流。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1935年至北平，做顾颉刚的研究助理。1936年任《禹贡半月刊》编辑，1937年主编《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到齐鲁大学任职，童书业则在上海博物馆工作。1939年起，童书业在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授历史、地理课程。1949年后北上，自1952年起，长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从事史学教学和研究。1968年1月8日卒于山东济南。

童书业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和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历史理论研究、春秋左传研究，先秦思想研究和古代经济史研究等方面有丰硕的成果。著作有《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古代东方史纲要》、《童书业古代社会论述》、《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等。当然，童书业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心理学，古器物学、中国画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其贡献。

笔者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专业学生，知道童书业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对他的具体学术成就则所知甚少。今年是童书业诞

辰百周年纪念。笔者近来阅读和研究了他的史学著作，下面根据童书业的相关著作，对他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一系列贡献，作一粗线条勾勒。写这篇纪念文章，自知不能阐述其史学精蕴，仅仅是思慕、缅怀这位乡贤而已。

二、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五四运动以后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初阐发，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经过社会史论战，有了发展。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定型和成熟。新中国建立后，在史学研究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少史学家，诸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都是杰出代表，童书业也是一样。1929年，童书业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受其影响。在北平时，他与坚持唯物史观者有所接触。1938年到上海后，与这方面的人接触更多，阅读马克思主义论著亦逐渐增多。1949年，童书业在光华大学开设辩证唯物主义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童书业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女儿童教英说：“至一九四九年后，童先生确实将相当的精力用于马列主义理论”^[1]。

童书业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不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在历史研究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童书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先秦史进行系统的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但又承认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任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确信有怎样的社会经济就会有怎样的思想意识。童书业正是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进行史学研究。他在研究先秦“七子”思想时，就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研究下了功夫。比如，他的《〈论语〉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现象》和《〈孟子〉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就是这个观点，认为《论语》中所反映“基本生产关系，是贵族国家和一般农民对立的关系”，“孔子和他弟子所提出的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是最足以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2]。童书业认为《论语》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及“上失其道，民散之矣”（《论语·子张》）等，涉

及到当时的分配问题。因为“不均”是“贫富分化的现象”，“即使就贵族阶级内部来说，一部分大夫和士的贫困下降，也是一种贫富现象”^[3]。从而导致阶级矛盾尖锐。为此，童书业以为，孔子和他的弟子针对上述的社会问题，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均无贫”（《论语·季氏》）。由此童书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论语》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现象，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和春秋中叶以前相同的。但也有新的社会现象，这些新的社会现象，只说明社会经济的变化已在开始，至多只有初步发展。这些现象的出现，还不能证明：社会较大的变化已经完成，或初步完成。”^[4]

童书业主张西周封建论，即西周由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他的这个结论触及到西周的生产方式，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生产者和剥削者的身份以及剥削方式等方面来阐述西周的社会性质，应该说是坚持了历史唯物论。

1951年，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作后，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完善了他的“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根据东方国家，尤其是印度社会中保存的原始社会残余研究的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观点。一石激起了千重浪，童书业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撰写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文章，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为了撰写古代史分期论文，童书业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古代史分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经典著作，童书业都反复研读。他曾经说：“关于这个问题(古代史分期问题—引者)，我认为还得深入讨论一下，在这里我只扼要一谈，我最近的见解，还是先从理论方面说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观点究竟怎样，根据我个人初步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不曾确定说封建社会必须先有发展的铁器；相反的，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在古代很早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农奴制度，而且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一样，都是原始部落财产制度的继续发展；列宁则把‘亚细亚制度’认为是农奴制度。所以所谓‘古代的生产力不能产生封建社会’的理论，在马、恩、列的著作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这种理论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也找不着的真正的根据，斯大林同志只提出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是‘熔铁和制铁工作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车的散布’等等，并不曾说这是产生封建社会的先决条件。我细读了

斯大林同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才了解这本著作中所说各社会阶段的生产力，乃是这个社会的最高的最典型的生产力，而不是产生这个社会的先决条件”^[5]。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童书业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理论进行研究，并且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他的古代史分期讨论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去分析的。

不但如此，童书业自1950年起还在大学开设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课。主要讲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他认为此书是恩格斯吸收了马克思、摩尔根有关人类古代社会研究成果，融合恩格斯自己的深刻研究精心写成的著作，是研究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古代发展状况的必须精读的著作。在讲授中，童书业尽可能忠于原作的梳理和解读，使学生们受益匪浅。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授，让学生以此为指导来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

三、先秦史研究的贡献

史学界一般认为秦以前的历史为先秦史，包括远古、西周、春秋、战国。童书业在我国先秦史的研究占有一定地位。他所撰写的《春秋史》是研究先秦史重要成果。1935年至1937年，童书业赴北平作顾颉刚私人研究助理，奉命为顾先生写其在燕京、北大的授《春秋史》之讲义，并精心搜集和考证春秋史史料，初步写成《春秋考信录》。1938年，童书业辗转上海。1940年，按照顾先生的要求修订了《春秋史讲义》，约21万字，并以“童书业”之名出版了《春秋史》。该书有17章与1个附录，分“正文”、“考证”两个部分，正文约16万字，考证30万字。童书业在《自序》中曾这样说：“(七七)事变后，我带着这部讲义避地到安庆，又由安庆带来上海，虽然十分为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它。去年(1940年—引者)夏间，接顾师从成都来信，命我替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我当时回信说：《春秋史讲义》的体裁尚好，当年写的时候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顾师复信同意这一点，不过他说：这本书是你所写，现在我们分处遥远的两地，无从仔细商讨，就用你一人名义出版吧！我即遵命于去冬开始着手修撰”^[6]。

对于童书业的《春秋史》史学界的评价是十分高的。史学名家吕思勉是童书业好友，著作杀青之时，他“喜得先睹”，并为童书业的《春秋史》作了序。在序中对该书作了评价。吕思勉说：“鄞童君丕绳，笃

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遂。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或此一编。其体制倒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也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吕思勉在这里不仅指出童书业是鄞县人，而且指出其书在我国春秋史研究中的地位，称“言春秋”是没有“逾于此书者矣”。可见童书业先秦史的研究在国内是有影响的。

他的先秦史研究除《春秋史》外，还包括《春秋左传考证》、《春秋左传札记》、《春秋史料集》。这些都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完成的。1945年至1965年，童书业在若干学术领域进行探索，但仍关注《左传》。1965年，他重拾春秋史和《左传》专题，撰写《春秋左传考证》第1卷，由其夫人誊清。同时，重新搜集春秋史史料5册，作《春秋左传考证》第2卷。1966年6月，“文革”发生，童书业怕抄家毁他的心血，于是将《春秋左传考证》等未发表的作品包装后交即将封门的山东大学历史系资料室。1967年下半年，他认为《春秋左传考证》太繁复，为此将其简括成《春秋左传札记》。“文革”后，经顾颉刚的审阅，童书业的《春秋左传考证》第2卷、《春秋左传札记》及与此二稿相关的稿件合在一起，以《春秋左传研究》为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10月出版。

学界认为《春秋左传考证》是以社会发展观念审视古籍，考求春秋这一中国古代社会变化最激烈时期的历史真相。对此，史学界对其有较多评论。1973年，顾颉刚在给童书业女儿童教英的信中就这样评论《春秋左传考证》这部著作：童书业“以他最强的记忆力和最高的理解力，结合清代的考据资料与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能创新格成此伟著，超前人，为20世纪的一部名著”^[7]。

童书业先秦史研究中另一个贡献是对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的“先秦七子”的研究。其实在童书业早年，他就有志于作《七子学案》，反映他对“先秦七子”研究的浓厚兴趣。由于其他学术领域的见解汨汨涌出，使他无暇专注于“先秦七子”的探讨。这个愿望到20世纪50年代才实现。1959年，这是国内政治最敏感的时间。童书业受命开设与政治密切关联的且最敏感的《先秦思想史》的课。从这一年起，他先后完成了《孔子思想研究》（1959年）、《孟子思想研究》（1960年）、《先秦思想专题研究讲稿》（1960年）。1961年至1963年，童书业完成了《荀子思想研究》、《墨子思想研究》、《老子思想研究》、《庄子思想研究》，直到1965年才最后完成《韩非子思想

研究》。应该说，思想史具有极强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童书业在他的“七子”研究中也普遍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涉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此种思想是处在那个时代气氛中融入了童书业学术主体的真诚意识。这也是不足为怪的。童书业在生前，先后发表了《孔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0年第1期）、《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1年第3期）和《荀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3年第3期）余下的4篇则是童书业在“文革”后面世的。

童书业的“先秦七子”研究内容丰富，对每一位思想家基本上以“宇宙观”、“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对于每一位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独特之处也进行阐述。孔子教育思想丰富，就专门写了“教育思想”内容，孟子主张“性善”，就写有“性善论与教育思想”内容，庄子有“人生哲学”与“天道观”内容。

对于“先秦七子”思想的评述，童书业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历史人物要看到其进步一面，也要看到其落后一面，也就是要分清“精华”与“糟粕”。比如，对于孔子研究，童书业就这样评论。他认为，从孔子的政治实践、政治理论和对教育，宗教的看法以及举贤才等，证明孔子在政治上有进步的一面，其“大一统”、民主主义等思想也有“萌芽”。“当然，我们绝不否认孔子的政治思想有落后一面。但在后世起作用的，乃是他思想中的进步一面。……生在春秋末年的下层贵族孔子，不可能不称文武、周公，依托‘周道’来发表自己改革社会、政治的见解。他的见解的实质，乃是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及他适应这种现实的反映。认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分别孔子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肯定他的好的东西，而批判他的坏的东西”^[8]。这一思想是非常有见地的。

四、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

考证、辨伪自古有之。尤其是中国“史前史”，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在仅有不多的先秦典籍中，有关“史前史”的描述多系后人根据神话传说整理而成，使人难以相信。早在战国，孟子就对文献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中唐以后，考辨逐渐兴起，韩愈、柳宗元都善于考辨古籍。宋元明进一步发展，欧阳修、郑樵、王应麟、胡应麟都对文献进行考辨。在清代更涌现出不少大家，诸如顾炎武、戴震、全祖望、阎若璩、崔述